

• 社会学研究 •

中国体验、社会转型与国民心态笔谈

编者按：“中国体验”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在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发生的微观变化。有关“中国体验”的叙事说明，仅仅研究“中国经验”即中国社会几十年来在宏观经济与社会结构发展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是不完整的。中国体验还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这同中国经验一起，构成了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转型的双重视角。进一步说，对中国体验的研究也不是单向度的。作为一种转型人格或转型社会心态，中国体验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两极化或二元化，这种极化特征的最典型内涵就是积极与消极并存。本期的五篇笔谈，指出了中国体验的现实性和独特性，涉及市场转型带来的中国体验的二元性，诚信危机和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心态变化，并对国民心态的调整做出了有价值的建议。

中图分类号：C912.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2)05-0061-11

中国体验的现实性与独特性

周晓虹

(南京大学特聘教授、社会学院院长、博士、博士生导师)

我们这里所谈论的中国体验即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在最近30年中所经历的微观嬗变，这是转型社会学所必须关照的主题之一，或者干脆说是一种转型社会心理学，或是方文所说的“转型心理学”。^[1]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之大和影响之深，不仅表现在它浓缩了人类社会变迁的诸多历史进程，带有文明转折的意蕴，如孙立平所言，“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重大的事件，都发生在中国，而坎布里奇（哈佛大学所在地），反倒像边陲小镇”^[2]；而且在于，生活在转型时期的这一代或数代中国人，在自己短短的生命周期中几乎以一种精神“填鸭”的方式，经历着浓缩了几个世纪的嬗变，这种嬗变对这13亿人的精神或心理重塑称得上是旷古未有。

既然我们谈论的是这样迅即和巨大的转型，以及在转型背景下作为一个现实整体的中

国人的精神嬗变，那么能够想象的与此相关的两个重大问题自然会是：其一，我们所谈论的这种中国体验，或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是真实的吗？也就是说，中国体验作为一种整体的精神感受是否具有现实性？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说，如果单就个人生活而言，伴随其生活环境或个人境遇的变化，其人格和社会行为模式自然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改变，这符合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则；但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国民呢？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整体，比如整整13亿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他们的总体精神世界同样也像个体的精神世界那样会发生某种基本一致的变化吗？其二，如果13亿中国人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真的经历了某种基本一致的精神嬗变，那么，这种嬗变究竟具有怎样的独特性

呢?比如,和历史上中国人曾经经历的那些精神嬗变相比,或者说和世界上那些同样经历了巨大的现代化变迁的国家的国民精神嬗变相比,所谓“中国体验”究竟有哪些独具的特点或特征?

理解“中国体验”的现实性,首先涉及到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诸如阶级、民族、国民这样的人群共同体存在某种集体的或共同的社会心理或社会心态。众所周知,来源于不同学科的社会心理学家分属社会唯名论者和社会唯实论者两个主要阵营:前者认为只有个体是现实的,而社会只是一个虚幻的存在物,是标示这个虚幻存在物的一个名称,因此,所谓群体心理如弗洛德·奥尔波特所言,不过是人们通过想象建构起来的一种“群体谬误”^{[3](P4-13)};后者则认为社会固然是由个体组成的,但一旦个人组成了社会,社会就有了独立存在的特性,或者说成了一个实体的存在,具备了组成它的单个个人所不具备的“突生性质”。正因此,持社会唯实论观点的社会心理学家如安德烈耶娃认为,“除个体意识之外,还存在着表征团体心理性质的某种东西,并且个体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这种东西来决定的”^{[4](P30)}。不过,“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不同的人说法不同:比如,黑格尔使用过“民族精神”,迪尔凯姆使用过“集体表象”,韦伯使用过“资本主义精神”,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论述过那种“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5](P245)}。另外,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也论述过环境、法律制度(联邦制度、乡镇制度和司法制度)和习俗塑造了美国人独特的国民性格,使得他们“往往不会为政治激情所振奋,他们的胸膛中激荡的是商业激情”^{[6](P126)}。显然,这里所指的美国人,不是单个的个人,而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成员。

作为社会唯实论者,我们显然承认包括阶级、民族和国民心理在内的群体心理存在及嬗变的现实性,也承认正是由于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13亿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才会在整体上发生同样迅疾的历史性嬗变,形成所谓“中国体验”。中国体验的这种现实

性,起码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1)中国体验是一个特殊历史时代的“国民性”,或者说是一种转变中的国民性格的组成成分,是13亿中国人在改革开放这个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种心理与行为特征之总和。它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的基本社会心态、精神感受与情绪氛围,是一种与时代密切相联的时代精神。(2)中国体验的现实性首先取决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大转型的现实性。我们已经看到,30年的社会大转型不仅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奇迹”,使得中国一跃成为GDP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而且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社会组织方式、社区和社区管理方式、人们的就业方式,一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种现实生活的背景,这一系列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变化,不能不影响到生存其间的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心理。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体验的现实性,是由中国经验的现实性决定的。(3)同英克尔斯等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的一样,我们一方面承认中国体验是中国国民的一种整体社会心理,但另一方面也意识到由于阶级阶层地位不同、生活的城乡环境不同、接受的文化教育不同、从事的职业类型不同,中国体验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精神状态(用英克尔斯的话来说,不是一种“单峰”多数人格^{[7](P16)},它本身也是多元的、复杂的。所以,在我们讨论中国体验的积极进取的一面时,方文也会看到中国体验的忧伤维度^[8],马广海在本次笔谈中则会论述贫富差异也是一种中国体验。

如果说中国体验具备鲜明的现实性,那么,作为一种与时代环环相扣的精神感受,它又具备怎样的独特性呢?显然,中国体验的首要的独特性,必然涉及中国历史上其他巨大的社会转型带给当时中国人民的精神感受。远的不说,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有两次,一次是因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而起的朝向现代的转型,另一次是1949年的共产主义胜利而引发的中国社会的巨变。这两次大变迁都给传统中国带来过变革的希望和变革的现实:1911年,皇权被推翻,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明的东进,“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旗招展,确实

使传统的中国人在价值观和社会行为诸方面发生了朝向现代的演进;1949年,蒋家王朝旧政权被推翻,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对社会的经济控制权、政治支配权和行政干预权,重建了中国城乡的新秩序,也确实给大多数中国人带来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希望和兴奋。令人遗憾的是,前一次大变迁因为后来的“军阀混战”和“日寇入侵”而夭折,几亿人民很快陷入更加巨大的苦痛之中;而后一次大变迁,却因为高度整合的刚性社会体制和领袖人物的个人专断,在短暂的成功、兴奋和激动之后被阻断,社会走向大动荡和大灾难。严格说来,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始终没有走出传统的束缚和制度性的压抑。

1978年后发生的大变迁和社会转型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场大变迁最为重要的特点是:在广度上,它从经济领域的改革开始,推向社会生活的纵深领域,现在正在向被称之为“改革攻坚战”的政治领域尝试性地推进;在深度上,它所触及的层面非常深刻,有相当一部分触及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和我们这个社会体制的深层结构,由此带来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大动荡、大起伏;在时间的持续性上,如果说,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持续了10余年就寿终正寝,1949年的革命到1958年的“大跃进”实际上就进入了“危途”,那么,这次的大转型历经30余年仍然未见颓势,虽然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愈益显现,但中国社会依旧表现出了强劲的向前发展的趋势。

我们要论述的第二种独特性,涉及到同西方发达国家的比较。我们这场大变迁单就变迁的规模和速度而言,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毫不逊色。从规模上说,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从1978年起通过改革和开放迈向了现代化的新时代,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从速度上说,一个新旧两种传统如此深厚的国家,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后向着现代社会全面转型,在短短的30年中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就,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第一次。进一步说,因为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即所谓以市场经济为改革开放的导向,同时辅以政府的强有力的控

制和支持的“中国经验”,既给中国社会的转型带来了全新的动力或活力,也造成了中国社会独有的问题和困窘。中国体验从根本上说也是中国经验的一部分,是中国经验的精神层面或心理侧面,它在精神层面上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并因此而具备了其完整的独特性。

可以说,中国社会目前所经历的这场转型同先前的时代相比、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具有转型速度快、动力强劲、持续时间长、涉及的人口规模大,以及原有的历史传统深厚、现有体制具有刚性,甚至包括国家及政府权力不受制约等等特点。正是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人民在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上的感受和转变具备了鲜明的独特性,其基本标志是社会心理或精神世界的二元性更为突出,或者说它的两极化特征更为鲜明。我们在其他论文中叙述过,传统与现代的颀颀、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以及积极与消极的共存,都是中国体验的两极化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国人社会心理嬗变的鲜明特征。

费孝通先生生前曾以传统中国社会为蓝本,设想在今日中国建立一个人人都能“安其所,遂其生”的美好社会。^[9]但现在看来,只要我们的社会未能从转型中相对固定下来,我们的“中国体验”不能去除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换句话说,中国人不能从精神上解决“漂”的问题——这一理想的实现就依然待以时日。如此看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有赖于这种二元性或极化特征,而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成熟也同样有赖于这种二元性或极化特征的消失。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承认中国体验的现实性和独特性,描述与记录中国体验的二元性及其消逝过程,应当成为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社会心理学家的必修课程。

参考文献:

- [1] 方文. 转型心理学:以群体资格为中心[J]. 中国社会科学, 2008, (4).
- [2] 孙立平. 转型社会学:发展趋势与面临的问题[A]. 未刊稿, 2007.
- [3] Allport, F. *Social Psychology*. Boston, Mass: Hough-

ton Mifflin, 1924.

- [4] 安德烈耶娃. 社会心理学 [M]. 蒋春雨等译.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6] 周晓虹. 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 第一卷 经典贡献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7] Alex Inkeles. *National Character, a Psycho-social*

Perspective.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7.

- [8] 方文. 部分公民权: 中国体验的忧伤维度 [J]. 探索与争鸣, 2012, (2).
- [9] 费孝通. 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 我一生的研究课题 [J]. 中国社会科学, 1993, (1).

责任编辑 周文彬